

中国经济概论

李邦君 编著

ZHONGGUO JINGJI GAILUN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中国经济概论

李邦君 编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概论/李邦君编著.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181-642-0

I. 中… II. 李… III. 经济—概论—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4120 号

中国经济概论

李邦君 编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政编码:100710

电话:010—64269744(编辑室)

010—64245984(发行部)

网址:www.cctpress.com

Email:cctpress@cctpress.com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堡港印刷厂印刷

787×980 毫米 16 开本

10.5 印张 194 千字

2007 年 1 月 第 1 版

2007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5 000 册

ISBN 7-80181-642-0

定价: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4212247

前 言

1994年我曾主编出版过《中国经济概论》在全国外经贸系统高等院校使用。时隔数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原来这本教材显然不能反映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情况、新观点、新问题,重新编著反映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新变化的新教材,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今后教学的需要。

这次摆在读者面前的新版《中国经济概论》,是根据我二十多年来在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有关课程所作的教学笔记和收集的有关资料整理而成的。由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发生变化之巨大,经济体制和经济生活变化之深刻,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就业方式发展之多样,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焕发出的生机和活力之强大,改革与发展实践中积累经验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要想在一本书里用很少文字把它充分反映出来是很难办到的,因此,这次编著出版的《中国经济概论》不强求内容全面、逻辑体系严密,而是把经济发展带有根本性、战略性的几个问题,采用专题方式把它整理归纳出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教学需要,另一方面可引起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深究。正是由于采用专题方式来整理,所以在叙述各专题过程中为使每一个专题具有完整性,就很难绕开各专题之间带有某些共性的问题,尽管作者对此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还难以完全避免某些重复之感,只好敬请读者给予包涵和谅解了。

一本新书问世应该有其新意和特点。我编著的这本教材的新意和特点主要是:(1)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考察中国经济。其目的是试图

通过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演变的分析,使读者了解中国是文明古国,是曾经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呈现经济辉煌的古国,而走向经济衰退、产生贫困落后的原因是战乱,特别是外国入侵和过去政府的腐败无能。告诫人们保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对经济发展、繁荣富强的极端重要性。(2)综合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与制约因素。通过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分析,启发人们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紧迫性和重要性。(3)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今后经济改革与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4)基本阐明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改革、建设与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新格局构建和宏观调控等,同时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也作了展望。应该说,这本教材对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能帮助读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高对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认识,掌握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它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实践性,适合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选用,也可供同等学力或有一定研究能力的读者研究时作参考读本。

在编著这本教材的过程中曾参考了一批有关著作和论文,吸取了其中不少的精华,引用了其中一些有价值的资料,除在书中作必要的注明外,大部分未一一注明出处,恳请谅解,并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本书是适应教学需要编著的,偏重于从宏观层面告诉人们中国经济建设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而对于其中的有关理论问题未作深入探讨,加上本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材料的掌握跟不上社会前进步伐,书中存在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热忱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作 者

2006年10月28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历史演变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经济的演变	1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变	7
第二章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15
第一节 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挫折	15
第二节 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就和经验	19
第三节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及其解决条件	24
第四节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及趋势	27
第三章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与制约因素	32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32
第二节 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34
第三节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40
第四节 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发展	43
第四章 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和经验	50
第一节 中国经济转型的原因、性质和目标	50
第二节 中国经济转型方式和特征	54
第三节 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	57
第五章 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60
第一节 经济结构及其成因和意义	60

第二节	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内涵、依据和原则	64
第三节	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本任务	69
第六章	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80
第一节	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演化及其趋势	80
第二节	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85
第三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90
第七章	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95
第一节	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和国有经济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95
第二节	中国国有经济改革的原因、进程和成效	97
第三节	中国国有经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103
第四节	中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105
第八章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112
第一节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阶段和新特点	112
第二节	中国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117
第三节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120
第四节	中国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123
第九章	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要求和新格局	128
第一节	中国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128
第二节	中国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134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新特点和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139
第十章	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	149
第一节	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149
第二节	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	151
第三节	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手段	156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历史演变

中国是一个至今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人类文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我们要了解、认识中国文明史,必须要了解、认识中国经济五千年来的历史演变,从中可以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不同的特点。为了研究问题方便起见,本章主要对中国古代经济和近代经济的历史演变作一脉络性、粗线条的分析、考察。

第一节 中国古代经济的演变

中国经济历史时期的划分,在理论界不尽一致。史学界一般把中国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后期这一漫长经济阶段划分为远古时期中国经济、封建社会前期中国经济和封建社会后期中国经济这三个不同的经济时期。为叙述方便,我们暂且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统称为中国古代经济。我们的重点是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建立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夏朝(公元前 21 世纪—前 6 世纪)到清朝中后期(公元 1644—1840 年)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和特点。其间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态,延续了三千五百多年。这是一个大跨度的古代经济发展阶段。

在这一漫长的中国古代经济阶段,尽管其中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动乱,特别是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争和秦末农民大起义,经济发展也经历不少挫折和曲折,但总体上是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态势。在农业、工商业及政治、军事、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一、中国古代就成为世界上的农业大国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个巨大成就。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有很多

传说,诸如神农发明了农业、黄帝发明了农业、列山氏(或厉山氏)发明了农业等,这些传说都表明农业在中国历史悠久,是中国人发明了农业。据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 6000~7000 年时期,中国古代农业已形成了北方与南方两个起源区。北方起源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旱地农业为主;南方起源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水稻栽培农业为主。生活在这两大区域的氏族部落都适应了当地的自然条件,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逐步形成古代农业生产体系。在汉代,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征,并初步构建了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体系。大量历史资料表明,中国在很久的古代就已成为世界上的农业大国。

(一)土地制度的发展过程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是财富之母”。因而,土地制度成为传统农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核心问题。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夏代,沿袭原始社会解体后残存于奴隶社会的氏族公社所有制。氏族公社的土地分为“份地”和“共有地”。“共有地”收获以贡纳形式缴纳给酋长,称之为贡赋制度。这种“份地”和“共有地”是其后实行的井田制的雏形。在商代,奴隶主把土地画成“#”字形,分为“私田”和“公田”。“公田”收获全归奴隶主,这种土地制度称为井田制。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在公元前 300 年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社会逐步建立,建立地主土地所有制取代井田制,土地私有权开始形成。到公元前 216 年,秦朝(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命令,承认土地私有权。在汉代,国家将“公田”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分配给贫民,加速土地私有化进程。汉代以后,土地产权完整性受到国家的干预,但在不同朝代对地权干预的形式和强度是不同的。西汉至六朝的统治者对地权干预较弱;北魏创建“均田制”,对土地占有规模及其买卖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唐朝中叶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崩溃,统治者采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土地私有产权更趋完整。粗略地说,土地私有权成熟后,在大部分时期内,全国耕地的一半为地主阶级所有,另一半为自耕的小农家庭所有,地权分布相当集中。到鸦片战争前夕,土地集中程度有所提高,地主占有耕地高于一半,自耕农拥有土地则不足一半。地主土地和自耕农土地两者的比例此消彼长,反映了私有土地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豪绅的巧取豪夺、土地买卖典当、土地的继承和战乱及战乱后国家政权对土地的重新分配等机制作用而造成的平均程度或集中程度。

(二)土地经营

土地是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条件。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经营一直是家庭或农户为基本单位,经营规模很小。一般每个农户仅经营 10~20 亩土地。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在东汉至六朝时期是大量佃农依附于地主。除此

之外,在到鸦片战争前夕,绝大部分农民都有人身自由,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主要是佃农关系,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制以及接近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雇佣制较少。佃农与地主之间经常有斗争,结果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永佃制。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需要向地主交纳地租。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地租有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形态,但以实物地租为主,地租率较高,有些地区地租率高达70%以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虽然中国传统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即为小农经济,但农民家庭之间也开展某种交往和合作。尽管交往与合作的频率、程度及规模很小,但对现代化过程中超出家庭规模的组织形成及其形式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口与耕地矛盾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也是存在的。在明代以前由于朝代更换、灾荒战乱等因素作用,对于人口实际状况难以统计,但到16世纪的明万历年间,多方估计中国人口约有1.5亿。明末由于遭受内乱天灾、战争杀掠等破坏,人口锐减。在清初,官方统计全国人口为5000万,实际为1亿左右。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特别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增赋”以及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地”等改革后,人口有所增加。根据清代官方统计,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人口已突破2亿(2047万人),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已突破3亿(30148万人),到道光二十年(1839年)人口已突破4亿(41281万人)。与此同时,中国在历史上由于改朝换代造成耕地荒芜,官方对土地统计漏失较多。据历史记载,明万历年间全国耕地约有17.4亿亩,到清初仅为5亿多亩(近6亿亩)。此后,清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开垦荒地,全国耕地一直保持7亿~8亿亩。据估计,到鸦片战争前夕,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为10亿亩。可见,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大体上从1亿增加到4亿,而耕地面积从6亿亩增加到10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从5~6亩下降到2亩多,耕地增长速度大大慢于人口数目增长的速度,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非常突出。

(四)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在汉代,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生产技术已相当成熟。当时农具已发明使用,不仅出现了类似于近代的犁的生产工具,而且出现了最早的条播机——耧车。在清代,虽然继续采用古时的单畜轻犁的工具,但已有改进。如熟铁制造、生铁淋口的锄、镰等农具已很普及。在农作技术上,汉代已出现合理利用土地肥力的代田法和区田法,施肥、保墒、除虫和选种技术已相当先进。到了清代,生产集约化有了发展,平均每个劳动力耕地面积缩小,在早已形成耕、耙、耖、滚等方式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间种、复种、套种、转耕等方式,肥料种类有所

增加,单位耕地施肥量和投入种量也有所增加。随着公元9世纪(唐代)之后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水稻种植区的转移,农业技术有进一步提高。在11世纪初(宋代)已引进新的水稻品种,耕作制度进一步改进。在13世纪,中国开始广泛应用科学保护农业的方法,比英国还早5个世纪左右。同时,农业水利工程建设进展很快,成就不少。据记载,在春秋时期就兴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到18世纪,水利工程就达800多项,并形成北方凿井灌田、南方采用水车灌田的情景。清政府主持修建大规模水利工程,特别是治理黄河、淮河,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水患。到鸦片战争前夕,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达2亿亩。

由于历史上土地制度的变革、农业生产经营的变化、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民赋税负担的减轻等多种措施的实行,使中国农业在11世纪时,已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开始,全国粮食总产量由600多亿斤增长到了2000多亿斤,平均亩产由100斤左右增长到了200多斤,基本维持了人均500斤,以有限的土地面积解决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问题,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二、工业有了迅速发展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①这就告诉人们,能够提供剩余产品的农业劳动生产力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赖以建立的基础。

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具的改进。大约在5000年前,中国人经历青铜时代,出现炼铜技术。大约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末年和春秋早期,中国就出现了铁制工具。考古发现,春秋早期的黄河流域就有铜柄铁剑,长江流域就有小铁锤。这些铁器既有锻铁,也有铸铁。到春秋末年,冶炼技术有进一步提高,战国时期发现和开采的铁矿也不少。由于铁矿出现,冶炼技术的发展,铁制工具使用越来越多,推动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农业的一个划时代变化,就是牛耕的出现。史料证实,大约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之间,铁制工具使用不久,牛就广泛地用作耕田的畜力,使中国古代农业告别“刀耕火种”时代。铁制工具的使用,也给兴修水利、改善灌溉、排涝等提供了便利,从而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铁制工具的使用,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的手工业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大体系。官府手工业规模大,掌握了礼器、兵器、乐器等重要铁铜制品的生产,各国设有工匠、工师、工尹等官吏,从事手工业管理,并罗列具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5页。

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庶民,工艺分工也很细,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和草工等。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铁制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需求量增大,使民间手工业也悄然兴起,他们从事日常生活及生产工具的制造,并自产自销,很兴旺。同时,在春秋时期,由于各地的资源、人才、技术及工艺等种类不同,手工业也形成明显的地区分工的格局。《考工记》上就记述了这种分工情况:“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近手其地。”表明这些国家在某种产品生产上具有优势,非常出名。

在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进步。冶铸生铁的技术提高,铁器使用更广泛,铁制工具在战国中期已在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在三国时期,随着西晋末年北方人南徙增多,一方面补充了南方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尤其纺织业的发展。他们习惯于丝织服饰,使江南丝绸织造业迅速兴起,南京生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在隋唐五代时期,手工业规模扩大,不仅丝织、染色业在发展,而且造船、制瓷、水力磨粉、印刷、造纸、制糖业等都有发展,在较大城市都有相当种类的手工业作坊。在唐代,已出现独立的机织业者。在宋元时代,纺织、制瓷、造纸、印刷、矿冶等手工业有了显著进步:丝绸机织业者比唐代更多;瓷器工艺提高;使用普及,印刷相当精美并发明胶泥活字版、铅制活字板和木刻活字版。印刷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文化传播和造纸、出版业的发展,甚至为纸币产生提供条件。活字印刷和造纸技术是中国四大发明的内容,对世界有巨大影响。

到明清时期(清朝早期),手工业的生产技术更加进步,分工更细。在各种手工业品中,最重要的是各种纺织品。棉纺织业在明代已成为普遍的家庭副业,并脱离农业而独立存在。与以前朝代相比,明清两代手工业有很大发展,它的商品化程度比农产品的也有一定提高。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纺纱与织布的分离,有的只纺不织,专门卖纱,有的则只织不纺,专门卖布。江南一带棉纺织业成为当地主业。

三、商业的迅速发展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代中国在神农氏时就已有商品交换,商代的商业已有一定发展。史家认为商业的“商”源于商族的“商”,说明商族人善于经商^①。这表明距今 4000 多年前中国就有商业活动了。

西周时期,虽然重农,但没有抑制工商业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中“商不出则三宝绝”一句话,就肯定了商业是社会必需的。周文王曾“告四方旅游”,这里的“旅游”包括商人,指要对商人提供交易方便。西周时期存在民间交易活动,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品。

^① 叶世昌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后 9 月版第 13 页。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冶炼技术提高,铁制工具的使用,商品交换更为普遍,出现了从商的职业。为了发展商业,春秋时期的一些国家实行“通商惠工”“通商宽农”政策,突出通商。不但为了通商,而且还要保护商人利益。尽管当时商人地位低下,但因为社会需要和有利可图,所以出现一些大商人,而且一些身居显位的卿相也经商。据《史记·货殖列传》上记载,曾担任越国大夫的范蠡,在越灭吴后就弃官经商,到其子孙,已达到了“富巨万”^①。又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载,秦国的吕不韦,原是一个做珠宝生意的商人,他认为做珠宝生意盈利只能“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就可盈利“无数”,于是他靠经济实力,进行政治投机,出任秦之相国,封为文信侯,一度掌握秦国大权^②。商业兴盛,使市场扩大,商品繁多,城市也相应发展。春秋前期都城不大,国都方园 900 丈,卿大夫的都邑大的 300 丈,小的只有百余丈,而到春秋后期特别是到战国期间城市扩大,人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③,成为商贾之集、贸易繁盛的商品交换中心。

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开创了中国与西部地区贸易往来的历史。当时秦始皇修通了从京城咸阳到西部地区的驰道,既进行军用又进行贸易。西汉初期,对北方匈奴采取“私亲”政策,以配合国内“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到汉武帝的“文景之治”,西汉进入“盛世”。为解决西北边陲之忧,汉武帝当时决定开展一场打击匈奴的战争。作为战争的准备,汉武帝两次派遣他的侍从官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能实现联合西域大国大月氏共同参与对匈奴的计划,但了解到西域诸国的不少情况。第二次出使西域,顺利到达西域的乌孙国,并派副使到西域的诸旁国,宣传中原与西域各国友好相处、互通有无的必要性,取得巨大成效。西域诸国纷纷派遣使团回访汉朝,回国后向国王宣传长安的繁荣和西汉的强大,要求与汉朝发展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中西交往由此发展起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域(包括新疆、中亚和古希腊、罗马)的陆上贸易通道。由于养蚕缫丝、织造丝绸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久负盛名,古罗马贵族又十分喜好中国的丝绸,故称中国为“丝国”,又因为中国对西域贸易的商品又以丝绸为主,所以张骞通西域开辟中西交往的贸易通道,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陆上对外通道,它对中国和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往来作出巨大的历史贡献。

从东汉末年起,由于社会处于动乱、分裂状态,使中国古代经济出现总体上下降的历史趋势。但在某些地区也有新的发展。尤其东晋统治的东南地区没有受到战火破坏,有利于经济发展。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带来了中原地

①②汪石满主编:《中国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第 22 页。

③ 《墨子·非攻中》。

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大大加快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使江南地区经济赶上且超过中原地区,商业随之蓬勃发展,一批商业都市在各地出现。当时的建康(今南京)成为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刺激这里商业繁荣。许多都市店铺连毗,成为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中国同南海之间的商业贸易也在兴起和发展,广州成为南海贸易的大港口。

当中国古代经济经过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和南宋等跌宕起伏发展态势后,从元朝到清朝中后期的鸦片战争(1840年)前为止,又出现长达600年的经济发展时期。明朝的工农业产品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商业资本活跃,工商业城市繁荣,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1405—1433年期间的郑和下西洋,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南洋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贸易发展。特别是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统治的130多年间,农业、手工业、贸易和城市等各方面,都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形成“康乾盛世”。当时商业贸易达到了空前繁荣程度,出现商人阶层稳定、中小城市繁荣、农村集镇市场规模扩大、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的情景。对外贸易也有新发展,长期出超,使当时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只好运送大量的白银到中国来平衡贸易收支。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货币的发展。春秋时期的货币有铜、金、银、布帛等,产生铜铸币。到战国时期,不仅沿用春秋时期的货币,而且黄金的使用量大增,出现的金版货币,珠玉、龟贝、银锡等也具有货币性。秦统一国家后,秦始皇统一币制,将货币分为黄金(上币)、铜钱(下币)两等,珠玉、龟贝、银锡属于器饰宝藏,不再为币。唐代改革钱币的名称,改钱文为“开元通宝”,绢帛仍起货币作用,白银的货币性有所加强,杂货也可用作交换媒介。五代十国期间,钱币流通十分混乱。在宋、金、元各朝代,货币除用铜、铁钱外,还使用纸币。最早的纸币是四川交子,产生于北宋。宋、金、元的纸币都有过稳定流通的时期,后由于用它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通货严重膨胀,以失败而告终。到明清时期,实行以白银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的货币制度。自明后期起,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欧美国家用银元来平衡与中国贸易的逆差,使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并加入流通。在清朝,除使用银元外,小额支付和交易还使用铜钱。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变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间,中国经济在“康乾盛世”后出现了总体上处于下降的态势。这是西方列强侵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带来的结果。

一、西方列强侵略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中曾几次出现经济发展的长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还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传统农业社会内长不大。而西方于14~15世纪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却逐步发展,16~18世纪开始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18世纪后半期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并开始产业革命。正当“康乾盛世”把中国封建帝国大厦建造得辉煌极致的时候,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生产力发展把西方资本主义推向到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西方列强不择手段地向外扩张,到20世纪初,它们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处在殖民地统治下的落后国家和民族只能任其宰割。

中国是深受其害的国家。从1840年开始,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同中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在百年前曾是世界经济强国,但到清朝后期,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经济下滑,同西方相比,经济实力已出现很大悬殊。1840年,英国人口约2000万,年产生铁140多万吨,人均约53公斤,煤产量达3500万吨,修建铁路1350公里,拥有年消耗5.28亿磅(合480万担)的机器生产的原棉的纺织工业。而中国当时有4亿多人口,全国铁产量只有2万吨左右,人均0.05公斤,煤只有少量开采,铁路没有,纺织业以家庭手工业生产为主。^②这种经济实力的悬殊,使中国在1840年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经济更是一落千丈,走向衰退,成为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国家。

(一)近代工业发展缓慢

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直接受西方冲击。到1911年,全国共有近代工厂615家,资本总额为23258万元。其中,中国人办的工厂为521家,资本为13232万元,占资本总额的56.89%;民营工厂419家,资本为8855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38.07%;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工厂66家,资本为4377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8.82%;外资工矿94家,资本为7247万元,占资本总额的31.2%;中外合资工厂36家,资本为2753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1.84%。即使是由中国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王询、于秋华:《中国近代化经济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60页。

兴办的工业企业也是在西方直接影响下创办经营。

(二) 交通邮电发展艰难

到 1911 年,中国共修筑铁路 21 条,总长度为 9 618.4 公里。其中,由清政府借用外资技术和设备,由中国人经营的铁路有 13 条,长度为 5 192.78 公里,占总长度的 53%;由中国民间集资或由私人投资兴建、自主经营的铁路有 4 条,长度为 666 公里,占总长度的 7%;完全由外国人直接投资经营的铁路有 4 条,长度为 3 759.70 公里,占总长度的 39%。^① 对贷款修建的铁路、外国开办的采矿业和棉纺织业等企业,外国人经常找借口,争夺控制权。

公路运输在中国非常落后。汽车作为客货运输工具于 1907 年由德商在山东青岛开办由市区到崂山的短途客运,中国商人自己经营的公路运输业直到 1911 年才开始运营。当时使用的汽车,都是从外国购进的,运输路程也很短。内河航运基本上被西方列强控制,外国轮船在长江等内河任意航行。

(三) 对外贸易殖民化

鸦片战争前,外国船只到达了广州。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船只可任意进出中国港口,控制海关权和关税税率,控制沿海贸易,把持交通建设与营运大权。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共计被迫向西方开放通商口岸 36 个,约有 25 家外国远洋轮船公司、近 200 艘轮船进入中国。同时,按照不平等条约它们还在华获得铁路建筑权。这样,它们牢牢控制对外贸易权,加深对外贸易殖民地化的程度。

(四) 农村经济逐渐衰落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致使农村经济逐渐衰退:(1) 由于封建军阀、官僚、地主长期兼并土地,地权日益集中,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租种地主阶级土地的佃农、半佃农,与土地使用分散的矛盾尖锐,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2) 清政府把入不敷出的财政和战争赔款转嫁到农民身上,征收苛捐杂税;封建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和超经济的剥削又十分残酷,使农村经济备受摧残;(3) 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棉纱、棉布,使中国农村以棉纺织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受到严重冲击,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很快衰落,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4) 天灾人祸,社会动乱,严重破坏了农村正常秩序,农村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浩劫。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宰割,而当时清政府又腐败无能,

^① 王询、于秋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0 页、第 98 页。

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使灿烂文明的古老中国变为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族灾难深重的国家。

二、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凌辱,中国有不少志士仁人,试图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探寻自主自强的道路。他们先后提出“立宪救国”、“共私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等多种经世致用的良方,展现出中国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创业自立、报国惠民的勇气和激情。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令。孙中山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实现经济现代化,首先要发展交通,他指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计划在10年内建成10万公里铁路。他在《实业计划》中规划建海港、修铁路、公路、组建沿海和远洋商船队,治理、改良内河水系。为了搞好如此宏大的基础建设,他还提出利用外资、实行开放政策,主张“利用外资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为了能从西方国家获得资金,他提出可以请外国人承包筑路、出租路权、期满后再赎回的设想。他还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公平分配、吸引外国人才等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使孙中山的宏图大略、政策建议无法得以实现。但是,辛亥革命影响巨大,在辛亥革命推动下中国经济出现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变化:

(一)中国农村经济的新变化

第一,封建土地关系出现新变化。官田、公产私有化日益普遍;土地买卖突破了宗法关系的束缚,开展自由买卖,受到法律保护;虽然实物地租仍占优势,但货币地租有增长的趋势。

第二,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出现商品化。从1910年到1919年,粮食商品量、经济作物商品量均有较快增长。随着农产品商品量增长,商品率也在提高。粮食、棉花的商品率分别从辛亥革命前的16%、33%,增长到1919年的22%和42%。

第三,专业化生产的农垦公司显著增加。在南京临时政府关于“振兴实业”“垦殖荒地”的提倡下,专业化生产的农垦公司,在十年间建立300多个。这种公司的出现,表明农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

中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民族工业,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为止,